

「中國」和「外國」

——明清兩代歷史文獻中涉及國家與對外關係的用語

岸本美緒*

本文以明清兩代的《實錄》和經世文編為主要史料，對有關國家關係的語詞（比如，「中國」、「天朝」、「夷狄」等）加以定量分析，同時通過對記述史料的分析，來闡明這些語詞的使用法之時期性變化。

總結起來，有明一代，「中國」和「夷狄」這一對對比概念比較醒目，特別在明末時期，基於對外危機感的排外論調高漲起來。從清朝入關到雍正時期，「中國」、「天朝」、「夷狄」、「外夷」等語詞都很少出現，作為外來王朝的清朝對這些語詞的用法沒有形成明確的態度。進入乾隆年間，伴隨著乾隆皇帝的所謂十全武功，「天朝」和「外夷」這一對語詞的使用急速增加。乍看之下，明代「中國——夷狄」的對比和清代中期「天朝——外夷」的對比頗為相似，但前者的對比以種族為準，後者的對比以某種道德能力為準，兩者之間有很大的不同。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外國」的對比取代「天朝——外夷」而成為主流，這一現象往往被認為是從傳統世界觀向近代世界觀的轉變，但所謂的傳統世界觀當中的時期性變化也是不應忽視的。

關鍵詞：中國 天朝 夷狄 外國 梁啟超

* 日本國立御茶水女子大學大學院人間文化創成科學研究科
筆者要感謝國際漢學會議與會學者專家以及兩位審查人的寶貴指教。Helen Dunstan 教授特別提供我相關英文文獻的信息，謹致謝忱。

前言

雖然「中國」一詞的使用可追溯到先秦時代，但「吾國無國名」這一點是清末改革思想家最焦慮的問題之一。梁啟超在 1900 年發表的《中國積弱溯源論》中指出：

吾中國有最可怪者一事，則以數百兆人立國於世界者數千年，而至今無一國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釵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稱我者，而非吾國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商周也，曰秦漢魏晉也，曰宋齊梁陳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國名也。蓋數千年來不聞有國家，但聞有朝廷，每一朝之廢興，而一國之稱號即與之為存亡，豈不大可駭而大可悲耶。¹

據梁啟超說，國名的欠缺是中國數千年來的積弊，國名之所以欠缺是「吾國民以國家與朝廷混為一談」，「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而「此實文明國民之腦中所夢想不到者」。

其實，梁啟超的「吾國無國名」說和明代末期來到中國的歐洲人所撰觀察紀錄不期而合。十六世紀中葉在華南從事走私貿易的葡萄牙人 Galeote Pereira 在他的見聞紀錄《中國幽囚記》中指出，這個國家的居民並不知道

¹ 《飲冰室文集》之五（《飲冰室合集》1，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15。幾乎相同的主張還可見於 1901 年發表的《中國史敘論》（《飲冰室論集》之六），頁 3。其實，「中國無國名」這一問題在 1890 年代已經受到注目。1895 年刊行的黃遵憲，《日本國志》卷四，鄰交志中有云「考地球各國，若英吉利，若法蘭西，皆有全國總名，獨中國無之」。在此書里黃遵憲採用的新名稱不是「中國」而是「華夏」（黃遵憲《日本國志》吳振清等整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頁 94）。日本尾崎行雄，《支那處分案》（東京：博文館，1895）中也有「支那從來以朝名為國名」的論斷，有關部份被翻譯成中文，登載於《清議報》第二十四冊（1899 年 8 月）。追溯到江戶時代，十八世紀的日本學者早已指出「支那從唐虞以來數改國家，從古以來無一定國名」（前野良澤，《管蠡秘言》，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抄本，1777 年序）。

歐洲人所說的 China 等詞語。據他敘述：

所有印度的居民都叫他們 Chins，因此我請他們告訴我，為甚麼他們叫這個名字，或許他們有一個叫這個名字的城。（中略）他們對此的回答始終是，沒有這個名字，從來都沒有過。然後我問他們，整個國家叫甚麼名字，如果有別的民族問他們是哪國人，他們怎樣回答。他們告訴我說，（中略）整個國家叫大明，居民叫做大明人。²

Pereira 的如上觀察與後來的耶穌會傳教士的看法也一致。1582 年到中國，在內地活動了近三十年的利瑪竇也發現 China 一詞對當地居民而言是陌生的，並指出他們所謂的國名不外於王朝名：

中國人自己過去曾以不同的名稱稱呼他們的國家，將來或許還另起別的稱號。這個國度從遠古時代就有一個習慣，常常是統治權從一個家族轉移到另一個家族，於是開基的君主就必須為自己的國家起一個新國號。新統治者這樣做時，是根據自己的愛好而賦予它以一個合適的名稱。³

把上述晚清改革派的看法和晚明歐洲人的觀察結合起來看，「中國」這一詞似乎到了十九世紀末纔成為中國人國家認同的主要對象。雖然如此，「中國」這個語詞在十八世紀以前的史料中出現的頻度和語境因時期而有所不同，其變遷過程也相當複雜。⁴ 本文特別留意明末清初時期史料

² C. R. Boxer (博克舍) 編注 (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18-19。

³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5。

⁴ 關於歷史上「中國」觀念的發生和變遷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在此只舉若干有代表

中「中國」一詞以及相關語彙的使用情況，試圖由此來重新探討明清時代的國家認同問題。⁵

一、概略的變動

首先用定量的方式來概略地顯示「中國」以及相關語詞的使用情況。當然，明朝和清朝之間理應存在使用情況的不同，因為清朝本出自「中國」之外的夷狄之地；即使在入關以後，在滿洲人來說，「中國」一詞也很難作為自稱來使用。那麼，清朝支配下的漢人讀書人對「中國」這個語詞的使用方法，與明代知識人有多大不同？我們是不是應該把官方文書和民間經世文之類分開討論？基於這些考慮，本節的分析以明清兩朝的《實錄》和《經世文編》為主，將前者作為官方文章的代表，將後者姑且作為讀書人經世文章的代表，來進行探討。⁶

性的研究：王爾敏，〈「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收入於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作者自印，1977）；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

- ⁵ 作為通過語彙使用情況的定量分析來討論「中國」認同的例子，參看川島真，〈天朝から中國へ——清末外交文書における「天朝」「中國」の使用例〉，《中國——社會と文化》12(1997): 41-54（中文版：〈從天朝到中國——清末外交文書中「天朝」和「中國」的使用〉，復旦大學歷史系等編，《近代中國的國家形象與國家認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據川島的研究，在外交文書中，「中國」取代「天朝」的傾向在1850-60年代已經出現。但作者慎重地指出，這個現象不過是使用習慣的變化，未必表示「中國」一詞在19世紀中葉已經成為對外nationalism的象徵性語詞。據他說，「從『天朝』到『中國』這個自稱變化，與其說是從傳統到近代的變化，不如說是各個朝代裡存在的多樣用詞方式轉變之一」。另外，豐岡康史〈清代中期の對外政策決定過程とその敘法——乾隆嘉慶期の海賊問題を中心に〉（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論文，2010）也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來討論乾隆年間以後的「天朝」、「中國」等詞語的使用情況。
- ⁶ 實際上，經世文編（特別是《明經世文編》）中收錄眾多上奏文，從這點來說，官方文章和非官方文章之間的區別十分模糊。但從編輯的基本方針來看，兩朝經世文編所代表的，與其說是當時政府的政策，不如說是包括在野讀書人在內的多樣看法。當然，各種經世文編的編者基於自己的問題意識來選擇去取，難免會有某種程度的偏倚。比

1 「中國」和「天朝」——基於對《明實錄》、《清實錄》的整理

首先看「中國」一詞的使用情況。比較《明實錄》和《清實錄》，⁷「中國」出現的次數相差不多，前者為 745 頁 1280 次，後者為 709 頁 1544 次，但兩者之間有很大的不同。圖 1、圖 2 分別表示在《明實錄》、《清實錄》中各個朝代出現「中國」一詞的頁數。當然，各個朝代之間有長短的差異，所以除了頁數的直線圖表以外還用折線表示以十年為單位的平均數（即：一個朝代的總數除以年數，之後乘以十）。同時，考慮篇幅的長短，也表示以百卷為單位的平均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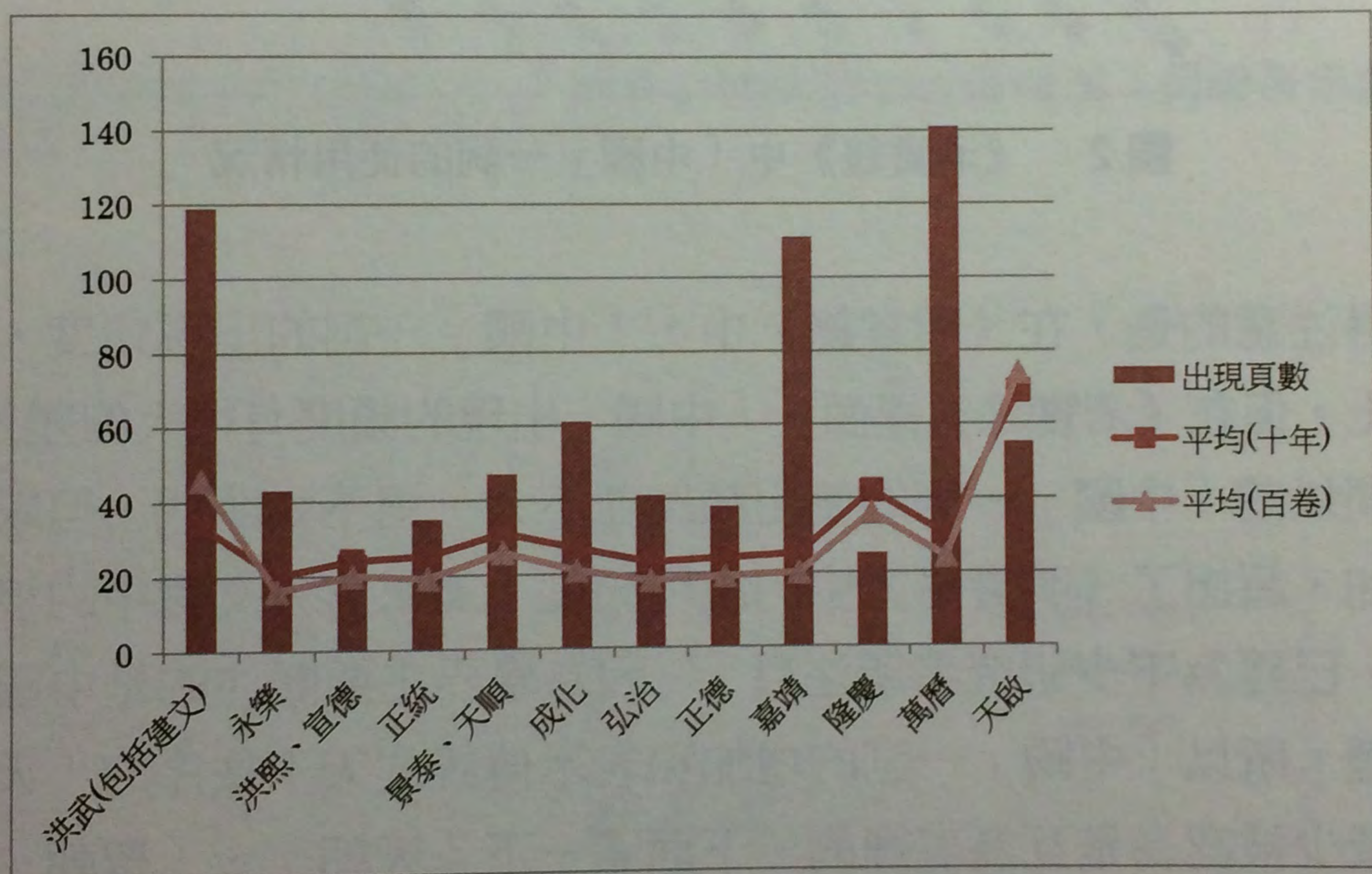


圖 1 《明實錄》中「中國」一詞的使用情況

如，在光緒年間編輯的葛士濬《皇朝經世文續編》、陳忠倚《皇朝經世文三編》等明顯著重於有關洋務、變法的文章。儘管有這些缺點，可是經世文編作為收入比較廣泛的經世文章之文獻，不失為初步探討士大夫用詞習慣的較好素材，至於更深入的分析，留待日後嘗試。

⁷ 在檢索《明實錄》、《清實錄》中的語詞時，使用了雕龍古籍全文檢索叢書系列（名古屋：凱希メディアサービス）中的《明實錄》和《清實錄》。統計中所謂的「頁」是指這個數據庫中的「頁」，一頁相當於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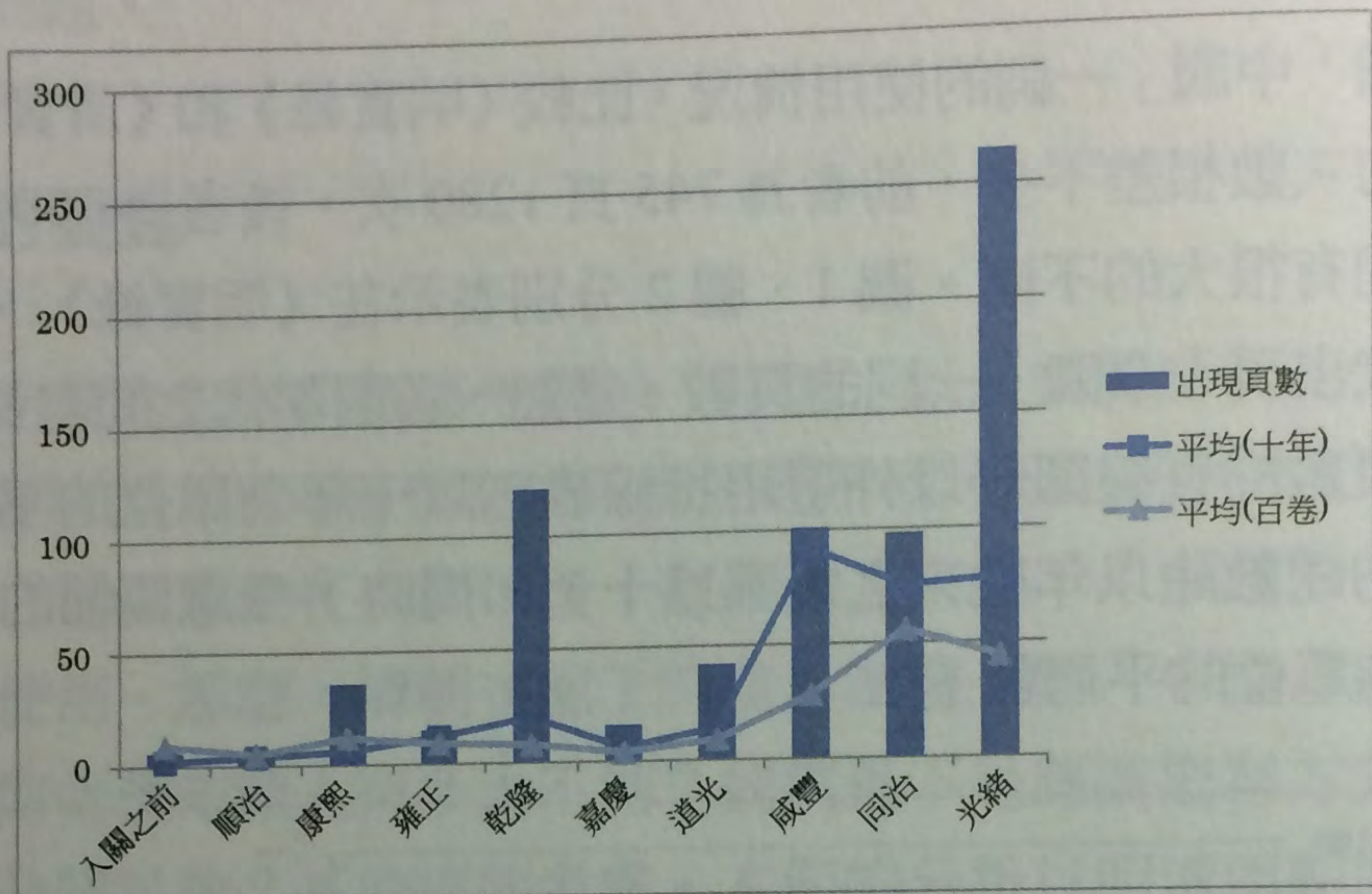


圖 2 《清實錄》中「中國」一詞的使用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實錄》中，「中國」一詞的出現頻度，沒有太大的變化，但在《清實錄》裡面，「中國」出現的頻度有很大的變化，即：道光年間以前「中國」一詞的使用頻度並不大，遠不如明代，但咸豐年間突然增加，超出了《明實錄》中的出現頻度。清末官方文書中的這些用詞之變化，已經為不少研究者所注目。⁸ 因為學界主要關注的是中國人世界觀的轉變，所以「中國」一詞的增加和表示傳統式天下秩序的「天朝」等詞語的減少被認為是互為表裡的。下面看一下「天朝」、「聖朝」等詞語的使用情況。⁹

⁸ 川島真前引論文主要使用《清代外交史料》和《籌辦夷務始末》進行研究，指出了在1850-60年代看得出從「天朝」到「中國」的緩慢變化。本文中整理出的《清實錄》中的數據也支持他的論點（關於「天朝」，在下文中討論）。

⁹ 「天朝」和「聖朝」在詞意上似乎沒有太大的不同，但因為兩者使用的頻度因時期而有所變化，所以在圖3和圖4中分別表示兩者的使用情況。除了「天朝」、「聖朝」以外，還有「華夏」「中華」等詞語，但在這裡選擇了出現頻度比較高的「天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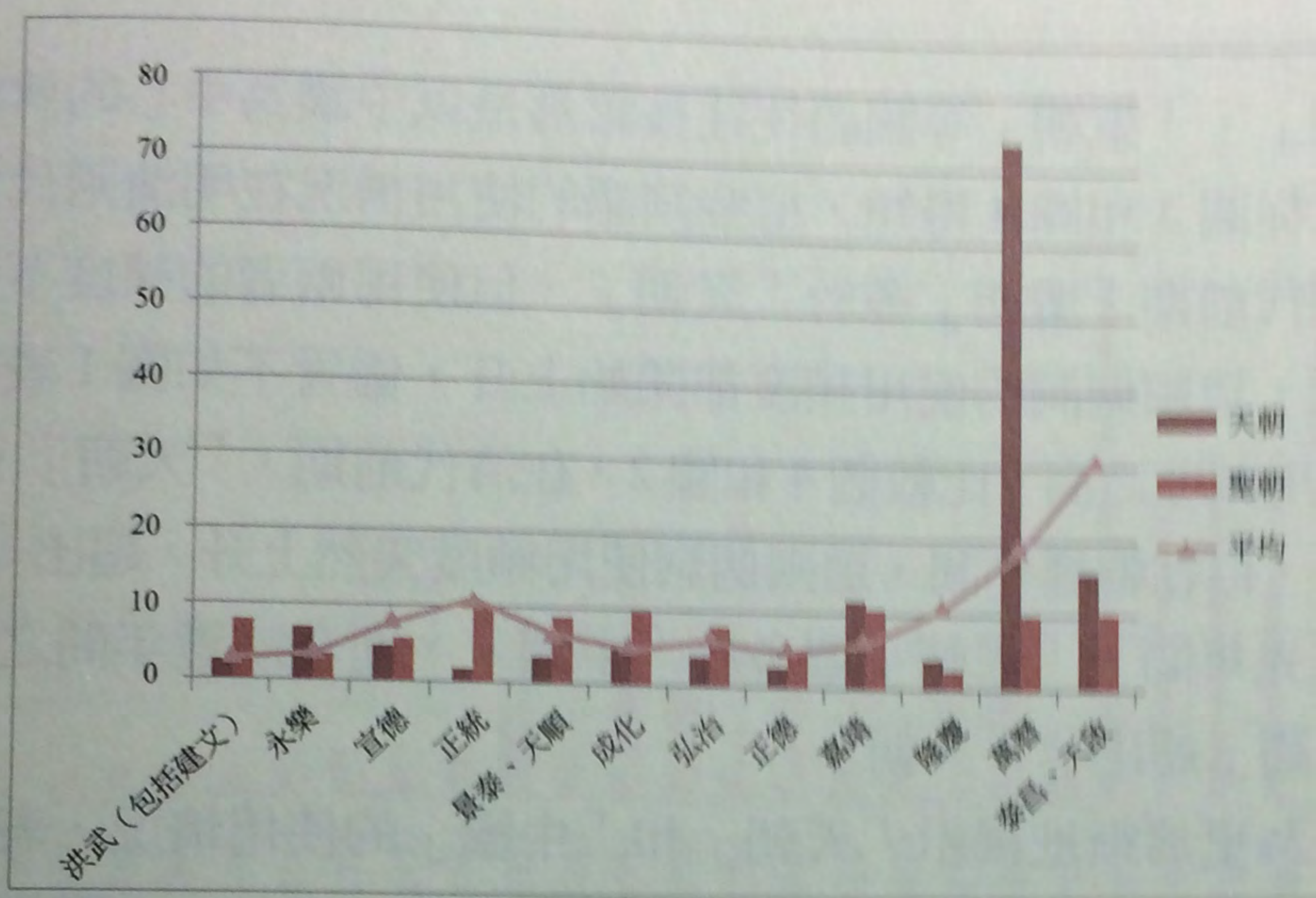


圖3 《明實錄》中「天朝」、「聖朝」兩詞語的出現情況（折線表示的是兩者合計之以十年為單位的平均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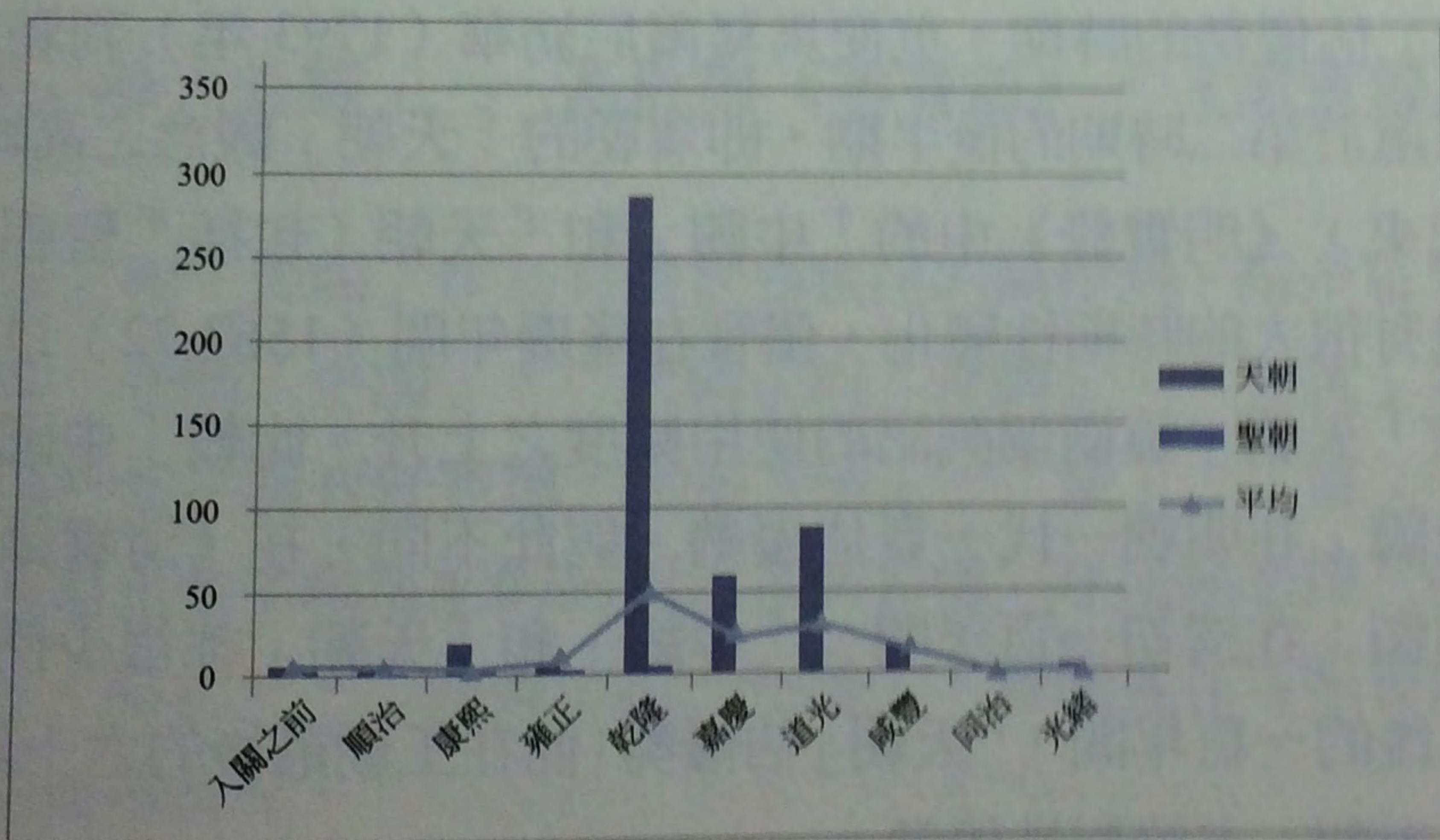


圖4 《清實錄》中「天朝」、「聖朝」兩詞語的出現情況（折線表示的是兩者合計之以十年為單位的平均數）

「聖朝」。「華夏」和「中華」出現的頁數分別如下：《明實錄》中，「華夏」65頁，「中華」38頁；《清實錄》中，「華夏」7頁，「中華」59頁；四種經世文編（下述）中，「華夏」35頁，「中華」161頁。

「天朝」、「聖朝」等詞語往往被認為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傳統世界觀的表現，但從圖3和圖4得知，這些詞語的使用情況在明清兩代呈現出頗大的變化。明代前期「聖朝」多於「天朝」，但使用兩者的頻度不大高。隆慶年間以後，這兩個詞的使用頻度都開始上升，儘管不如圖1表示的「中國」一詞使用頻度之高。比較圖4和圖2，在清代前期，「天朝」、「聖朝」很少被使用，但在乾隆年間，這兩個詞使用頻度突然上升，超出「中國」，在嘉慶、道光年間，「天朝」還多於「中國」，而在咸豐年間之後，趨勢逆轉，「中國」超出了「天朝」。

圖5是為更清晰地揭示「天朝」和「中國」的使用情況，表示了每十年的統計。基於圖5，我們可以劃分出三個時期，即：(1)入關至乾隆十年（1745）前後——「天朝」和「中國」都很少出現的時期；(2)乾隆十年至鴉片戰爭時期——「天朝」佔優勢的時期；(3)咸豐年間（1851-62）以後——「中國」佔優勢的時期。英使馬戛爾尼訪華（1793年）到鴉片戰爭前夕的時期正處於第二時期的後半期，即清朝的「天朝」觀念之高峰時期。

總結起來，《明實錄》中的「中國」和「天朝（包括「聖朝」）」的使用頻度沒有很大的時期性變化，儘管在隆慶年間（1567-72）以後看得出「中國」和「天朝」這兩個詞語的使用頻度之上升。比較「中國」和「天朝」，「中國」在明朝一代一貫佔優勢。與此不同，在《清實錄》中的變化則相當明顯：在清初一百年間，「中國」和「天朝」都很少使用；十八世紀中葉以後的一百年間，「天朝」佔優勢；而在王朝最後的六十年間，「中國」取代「天朝」占絕對性優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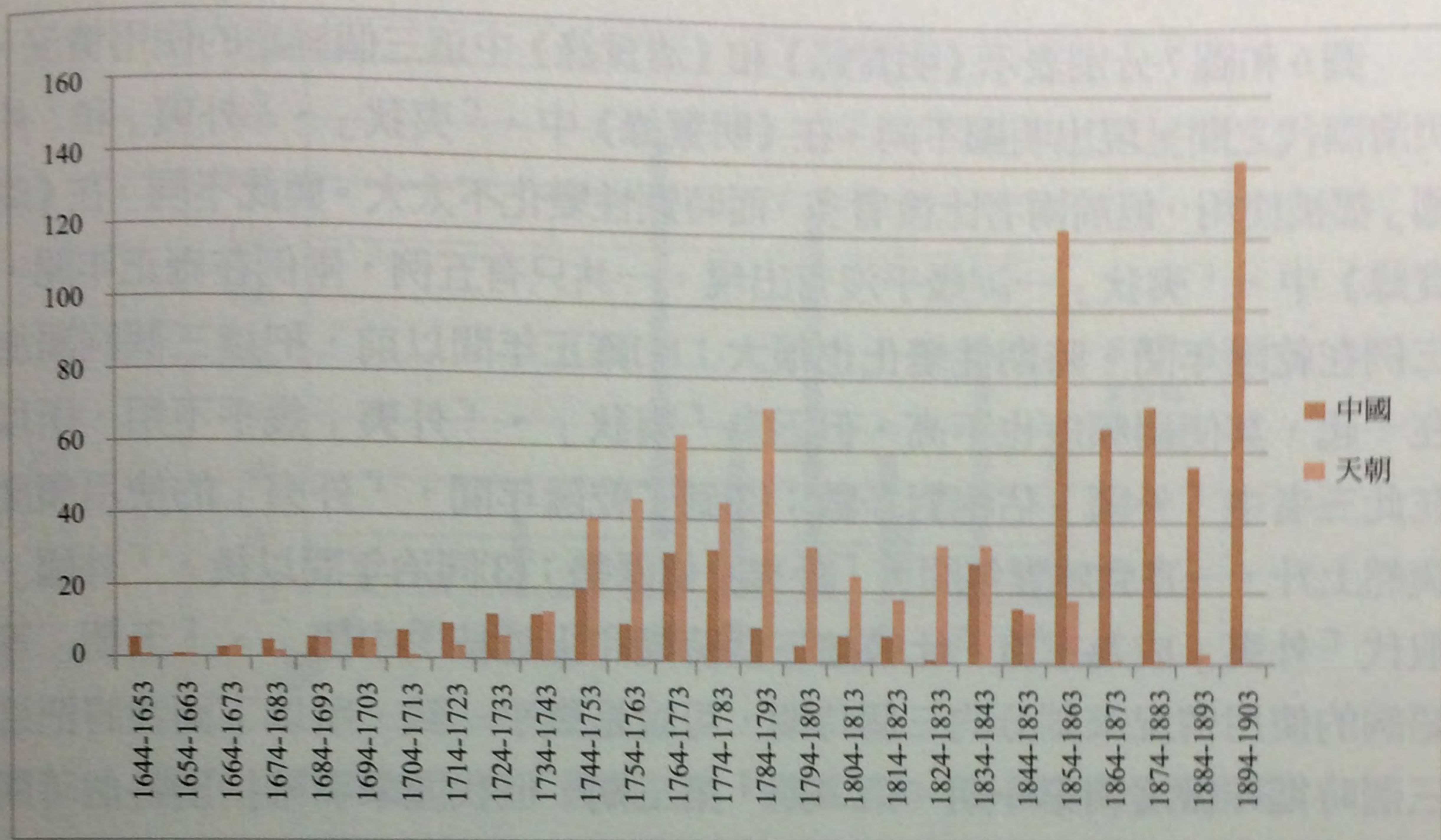


圖5 《清實錄》中「中國」和「天朝」的使用情況¹⁰

2 「夷狄」和「外國」——基於對《明實錄》、《清實錄》的整理

「中國」和「天朝」作為有關世界秩序的關鍵詞，暗示著外部世界之存在，亦即，包圍「中國」、「天朝」的「外國」、「夷狄」等等。表示這些外部世界的字眼有好多種，比如「夷」、「蠻」、「番」、「虜」、「洋」，而由這些字眼搭配的語詞也各式各樣。在這裡選擇三個比較常見的語詞——「夷狄」、「外夷」和「外國」，整理其在《明實錄》、《清實錄》中的使用情況。¹¹

¹⁰ 雖然圖表中用西曆表示年代，但實際上意味的是中國的年代（比如，1644-1653是順治元年到順治十年的意思），沒有精確地換算為西曆。

¹¹ 除了「夷狄」、「外夷」、「外國」以外還有許多相關語詞。姑且選擇若干語詞，調查其出現頻度的結果如下：《明實錄》中，「蠻夷」309頁（包括「蠻夷長官司」等官名），「番夷」176頁，「夷虜」131頁；《清實錄》中，「蠻夷」27頁，「番夷」124頁，「夷虜」1頁；四種經世文編中，「蠻夷」109頁，「番夷」82頁，「夷虜」88頁。

圖6和圖7分別表示《明實錄》和《清實錄》中這三個詞語的使用情況，明清兩代之間呈現出明顯不同。在《明實錄》中，「夷狄」、「外夷」和「外國」都被使用，但前兩者比後者多，而時期性變化不太大。與此不同，在《清實錄》中，「夷狄」一詞幾乎沒有出現，一共只有五例，兩例在雍正年間，三例在乾隆年間。時期性變化也很大：(1)雍正年間以前，把這三個詞語加在一起，其使用頻度也不高，但因為「夷狄」、「外夷」幾乎不用，所以在此三者中「外國」佔絕對多數；(2)到了乾隆年間，「外夷」的使用頻度突然上升，一直到咸豐年間，「外夷」佔優勢；(3)同治年間以後，「外國」取代「外夷」成為主流。比較這三個時期和上述按「中國」、「天朝」等語詞的使用情況來劃分的三個時期，可說是幾乎一致，所以下面我將把這三個時期叫做清朝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但我並未明確指出各個時期的開始年和結束年，因為各個時期之間有數年乃至十數年的過渡時期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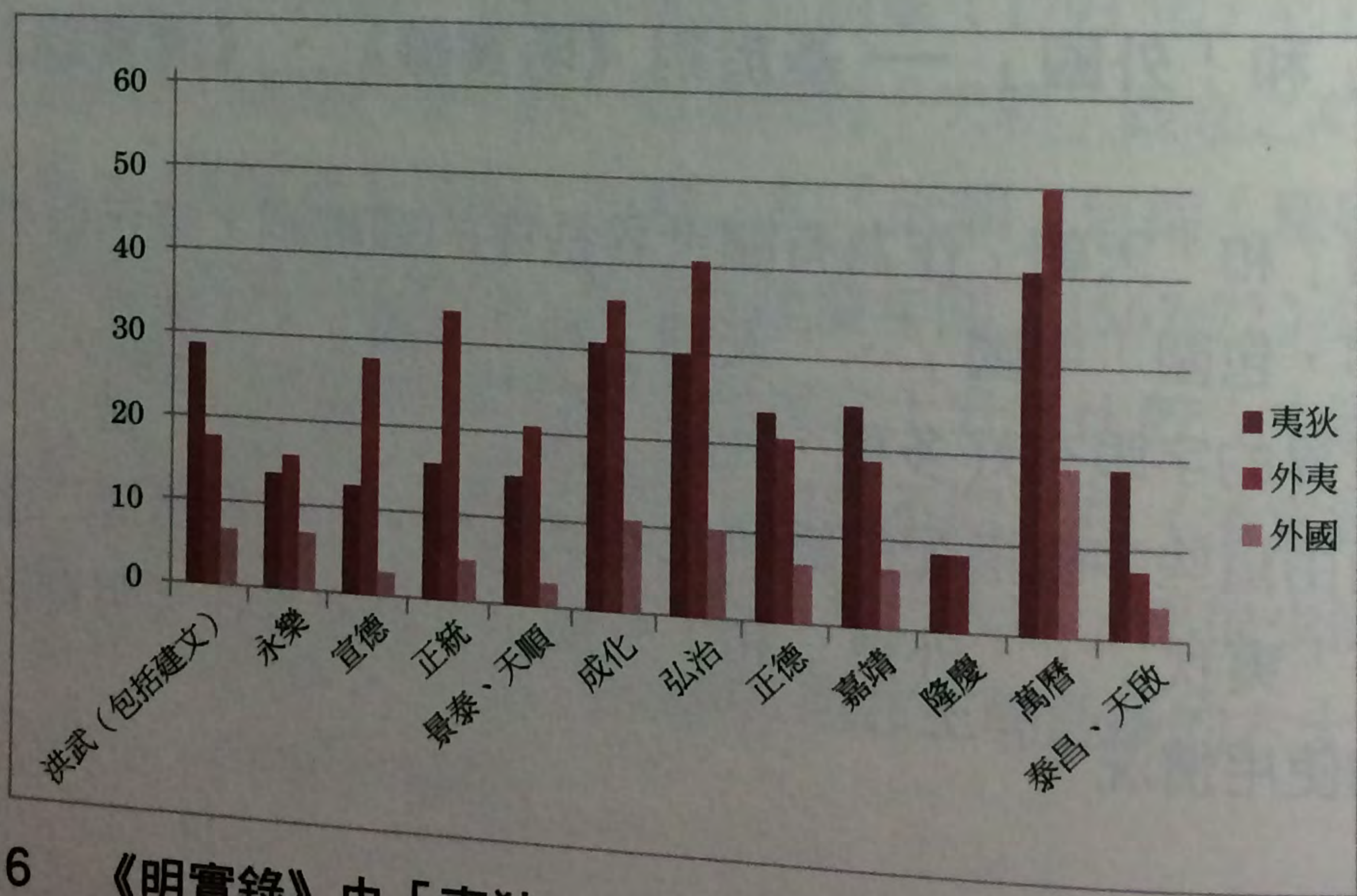


圖6 《明實錄》中「夷狄」、「外夷」和「外國」的使用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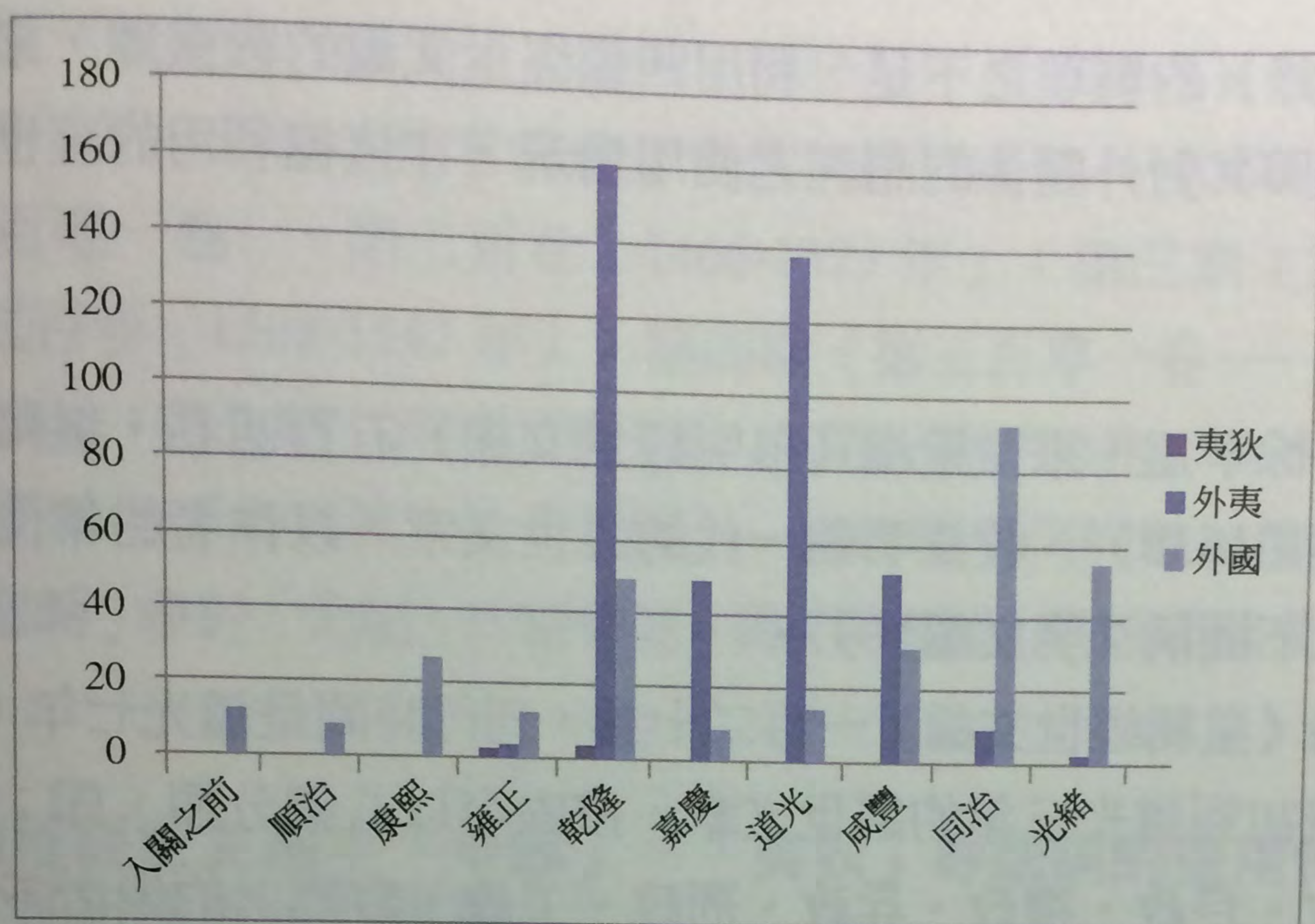


圖7 《清實錄》中「夷狄」、「外夷」和「外國」的使用情況

綜合上述基於《明實錄》、《清實錄》的分析，可知明代涉及國家與其對外關係的重要語詞是「中國」和「夷狄」、「外夷」；清代第一期沒有特別顯著的語詞；第二期重要的是「天朝」和「外夷」；第三期為「中國」和「外國」。

3 各種經世文編中的相關語詞¹²

《明實錄》和《清實錄》都鴻篇巨制，各項記載的日期也明確註明，因此在進行定量分析時，可提供十分有用的資訊。但由於《實錄》是中央政府的紀錄，未必能廣泛地反映出讀書人階層之用詞習慣。在此為彌補上

¹² 在檢索各種經世文編時，使用了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拇指數據庫·明清經世文編》。收入於該數據庫的是本文中列舉的四種經世文編。除了這四種以外，還有許多明清時代的經世文編，比如在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製作的數據庫收錄了七種清代經世文編。但因為本文使用經世文編的目的並不是全面性的定量分析，而不過是為了解概略的變動，所以在此只是用《拇指數據庫》來進行簡單的整理。

述基於《實錄》的整理之不足，利用四種經世文編的數據庫，來簡單地整理涉及國家與其對外關係的語詞之使用情況。在這裡利用的經世文編是以下四種：

- (1) 陳子龍、徐孚遠、宋徵璧編《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編輯時間是崇禎十一年（1638），收錄明朝一代的經世文章，以作者的年代先後為次排列（以下簡稱《明文編》）。
- (2) 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一百二十卷，刊行時間是道光七年（1827），收錄從清初到道光三年的經世文章，按內容以八綱分類，即：學術、治體、吏政、戶政、禮政、兵政、刑政、工政。實際上的編者不是賀長齡而是當時在賀長齡幕下工作的魏源（以下簡稱《賀氏正編》）。
- (3) 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一百二十卷，刊行時間是光緒十四年（1888），收錄了從同治到光緒初期的經世文章，分類法基本上循《賀氏正編》，而加入〈洋務〉一綱（以下簡稱《葛氏續編》）。
- (4) 陳忠倚編《皇朝經世文三編》八十卷，刊行時間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收錄光緒十四年後十年間的文章，九綱的題名雖然與《葛氏續編》相同，但內容則以「於富強有裨益」的西洋事情為多（以下簡稱《陳氏三編》）。

表 1 表示的經世文編中「中國」、「夷狄」等語詞的使用情況與上面總結的基於《實錄》的時期性變化基本上一致。即：在明代，「中國」和「夷狄」、「外夷」的使用例為多，而在清代第三期（就是《葛氏續編》和《陳氏三編》反映的時代），「中國」和「外國」佔優勢。特別因為《葛氏續編》和《陳氏三編》所收錄的以洋務派、變法派人士的文章為主，所以第三期的特點顯得更加突出。

表 2 表示《明文編》中各個語詞使用情況的時期性變化。《明文編》共有五百零四卷，文章是按照作者的時間順序排列的，因此這裡姑且以

一百卷為限，共分成五個部分（最後一部分為一百零四卷），即：第一期（第一卷——第一百卷，作者的進士合格年份是明初——1493年）；第二期（第一百零一卷——第二百零卷，1466-1523年）；第三期（第二百零一卷——第三百卷，1508-1557年）；第四期（第三百零一卷——第四百卷，1524-1571年）；第五期（第四百零一卷——第五百零四卷，1566-1634年）。表2中時期變化不大明顯，但「中國」一詞的使用例的增加趨勢，以及明代前期「聖朝」多於「天朝」的趨勢等，與《明實錄》的整理結果頗為一致。

表1 四種經世文編中「中國」、「夷狄」等語詞的使用情況（數字是出現該詞的頁數）¹³

	中國	天朝	聖朝	夷狄	外夷	外國	（全頁數）
《明文編》	696	92	52	258	128	19	4891
《賀氏正編》	102	12	24	0	9	16	3143
《葛氏續編》	412	23	35	5	23	157	2483
《陳氏三編》	992	7	13	8	22	211	1523

表2 《明文編》中的時期性變化

	中國	天朝	聖朝	夷狄	外夷	外國
第一期	113	8	18	75	23	3
第二期	126	15	6	57	19	4
第三期	145	15	6	43	40	2
第四期	153	20	10	41	21	5
第五期	159	34	12	52	25	5

¹³ 有關經世文編的統計中所謂的「頁」是指《拇指數據庫》中的頁數，一頁大概八百字。

《賀氏正編》所收錄的是清朝第一期、第二期的文章，但其用詞上的特點比較接近《清實錄》中第一期的情況，亦即沒有特別顯著的語詞，因而看不出作為《清實錄》中第二期特色的「天朝」、「外夷」這兩個詞的增加。實際上，《賀氏正編》中並不是沒有「夷」、「蠻」等藐視周邊民族的字眼，比如第六綱〈兵政〉中有題為〈蠻防〉的目，其中收錄了許多有關「苗蠻」、「滇夷」等文章。但是這些文章幾乎都是與處理邊境問題的具體政策有關，而炫耀天朝權威於天下這類意識形態上的色彩似乎比較淡薄。《賀氏正編》呈現出的這種務實趨向很難說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當時一般讀書人的姿態，但我們應該注意，清朝政府和一般讀書人之間可能存在用詞習慣上的不同。

上面整理的不過是數量上的變動，而沒有涉及到使用這些語詞時的語境和含意。以下我將試圖更具體地分析這些語詞到底是怎樣被使用的。

二、明代有關國家與其對外關係的對比概念——「中國」和「夷狄」

1 作為自稱的「中國」

用漢文寫作的文章中，「中國」一詞不僅指客觀的地理範圍，而且往往有「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領域」之含意，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漢文是「中國」文化認同的核心指標之一。但是這種含意的強弱，因時期而不同。明朝一代無疑是「中國就是自己」的感覺十分強烈的時期之一。試看一下「我中國」（包括「吾中國」）這類說法出現在《實錄》和經世文編中的次數。《明實錄》有50例；《清實錄》有22例；《明文編》有68例；《賀氏正編》有3例；《葛氏續編》有34例；《陳氏三編》有106例。

在《明實錄》的 50 例中，洪武年間的例子佔 21 例；這大概因為在明朝建國初期，明朝宣揚自己政權之正當性的關鍵在於強調明朝的中國性和蒙元王朝的夷狄性。比如，洪武元年十二月致高麗國王的璽書曰：

有宋失御，天絕其祀，元非我類，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殞絕其命。……朕……北逐胡君，肅清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¹⁴

在這裡所謂的「我中國」似乎包含著中國的正當支配者應該是漢人這層意思。另一方面，我們應該注意，「我中國」一詞，未必表示明確的華夷觀念。比如：洪武元年正月太祖即皇帝位時的祝文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¹⁵ 表示宋朝和元朝都是「我中國」的正當君主。

值得注意的是，在積極採取對外發展政策的永樂時期，「我中國」這種說法卻在《明實錄》中絕跡，「中國」一詞的出現次數也減少。像上列圖 1 所示，永樂年間是在明朝一代中，「中國」一詞出現頻度最低的時期。這一現象或許出於偶然，但也可能跟永樂皇帝的國家構想有關。據宮崎市定以來許多學者的研究，永樂皇帝的理想國家，與其說是排除異民族的立足於中國文化傳統的國家，不如說是元朝型的多民族帝國。¹⁶ 也就是說，「中國」（＝自己）和夷狄（＝他者）之間的對抗關係在永樂皇帝的國家構想中沒有發揮重要的作用。

「我中國」的說法，在宣德年間以後的實錄中也繼續出現，但其頻度不如洪武年間的高。在《明文編》中，「我中國」這類表達方式卻在明代

¹⁴ 《明太祖實錄》卷三十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條。

¹⁵ 《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九，洪武元年正月乙亥條。

¹⁶ 宮崎市定，〈洪武から永樂へ〉，《東洋史研究》27.4 (1969)1-23（後收入於《宮崎市定全集》13，東京：岩波書店，1992）。

後期增加。以上述五個分期來說，第一期為 7 例，第二期為 12 例，第三期為 17 例，第四期為 21 例，第五期為 11 例。《明文編》中「我中國」的說法主要出現在有關邊境問題的文章中，其語境與其說是作為天下中心而驕傲，還不如說是因中國勢力衰弱而焦慮。比如：

臣惟中國之於夷狄也，猶主之於奴也，猶首之於足也，足不可以凌首，奴不可以犯主，章然明矣。今北虜敢率醜眾犯我中原，前此猶未敢深入也，自去年始迫山西太原，罹其荼毒，野草猶腥，今年則復過太原矣，縱橫蹂躪，任其所之，如踏無人之境。其藐視我中國可謂極矣。¹⁷

在明末時期，特別成問題的是，「我中國人」和夷狄的合作關係，比如：「（北虜）其黨多我中國人，方其去時，不陷於搶擄，則迫於逃亡，而非其樂也」、¹⁸「倭之來，在海或仗我中國人為舶主，比登陸則又仗我中國人為地主。蓋倭以剽劫我中國人為利，而我中國奸人則往往以主倭為利。直、浙皆然，閩為甚，閩之泉、漳尤甚。」¹⁹無論主動和被動，明代中國邊疆出現了「父華而子夷也，父夷而子華也，或其身之迭為華夷也」²⁰的情況。據羅玘，地之有邊恰似衣服和器物之有邊緣，「然則邊之云者，中國之盡際，外此則為蠻，為戎，為羌，為狄，先王亦不得而兼治之。蓋越邊而求以為衣，求以為器物，不可也。然物之壞也，皆自其邊始。故先王於此尤慎之而重為之防」。目前中國邊疆華夷混亂無別，何可謂「吾中

¹⁷ 《明文編》卷二百二十一，程文德，〈滅虜六事疏〉。程文德是嘉靖八年進士，這裡涉及的是，嘉靖二十一、二十二年俺答侵入山西的事件。

¹⁸ 同前。

¹⁹ 《明文編》卷三百八十三，姜寶，〈議防倭〉。

²⁰ 《明文編》卷一百二十五，羅玘，〈送憲副張君之任陝西序〉。

國如完衣完器物然」？²¹ 我們應該注意，這裡所追求的「中國」形象是，如衣服、器物般，有明確輪廓的。「中國」的國土和人民被認為應該有不容混淆的邊界。

據上文所述之明末來到中國的歐洲人的觀察，中國居民除了「大明人」以外沒有對外自稱，但在《明實錄》和《明文編》中，「大明人」這一稱呼並未出現。外國人對中國人的確有時用此稱呼以表尊敬之意，²² 但這個稱呼在中國國內似乎不太普遍使用。

表3表示《明實錄》及《明文編》中出現「中國人」和與此相關的語詞之頁數（其中「漢人」包括不少意味著「漢代人」的例子，但姑且合在一起）。「中國人」（包括「中國之人」）、「華人」、「漢人」這三者之間在用法上是否有區別？就明代來說，似乎沒有太大的區別，可以互相通用。但在討論與國內族群（西南少數民族、回民等）的關係時，使用「漢人」為多。國內族群關係成為焦點時，這些概念之間的區別明顯起來。

表3 《明實錄》和《明文編》中「中國人」和與此相關的語詞

	中國人	華人	漢人
《明實錄》	55	35	83
《明文編》	52	30	63

2 「中國」的擡頭格式

關於明代文獻中「中國」的用法，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對「中國」一

²¹ 同前。

²² 比如，著名的日本學僧策彥周良在元僧中峰明本墨跡的跋文中寫道「大明人五峰先生帶之來」，這裡所說的「五峰先生」就是倭寇頭目王直。參看田中健夫，《中世對外關係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320頁。

語作擡頭或者空格的習慣。²³ 按規定，採取擡頭格式的是有關現王朝的語詞，比如，涉及皇帝本人或者與其行為直接相關的語句（「皇上」、「欽定」、「恩膏」等）、與王朝統治的正當性有關的語句（「天朝」、「圜丘」、「祖宗」、「郊廟」等）、與王朝的統治體制有關的語句（「皇城」等）等，其擡頭的程度（平擡、單擡、雙擡等）因對象語句所含敬意程度而有所不同。除了在寫科舉答案等場合需要嚴格地遵守擡頭規定外，在一般的書籍裡面規矩比較寬鬆，可以使用空格等簡略的表達方式。「中國」一詞本來不需擡頭、空格，這大概因為「中國」與其說是指統治的主體，不如說是指統治的客體。因此，在《實錄》等正式官方紀錄中原則上看不到對「中國」加以擡頭、空格的例子。但在若干種類官方文書裡面，擡寫「中國」的例子不是沒有，其一種是禮部管轄的朝貢文書，另一種是明末的兵部文書。

在朝貢文書中，擡寫「中國」的例子並不罕見，²⁴ 這是很自然的事，因為在周邊諸國來看，「中國」是作為朝貢對象的中華王朝之統治領域，應當表示尊崇之意。這類文書中擡寫「中國」的語境是讚揚對方、謙抑自己的外交禮儀，比如：「（琉球為）外藩撮土，總是〔雙擡〕中國飛塵」（《歷代寶案》第一集第十九卷，崇禎四年中山王世子尚賢咨文）之類。

2001年出版的《中國明朝檔案總匯》101冊影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遼寧省檔案館所藏明代檔案四千件左右，使我們得以窺見明代官文書的原貌，其中相當部份是天啟、崇禎年間兵部題本、行本的原稿（本文中總稱為「題、行稿」）。在這些兵部題、行稿中幾乎毫無例外地對「中國」、「中原」等語詞作了擡頭或空格，這一點饒有趣味。與朝貢文書不同，這

²³ 關於這個習慣的詳細情況，參看拙稿〈「中國」の擡頭——明末の文章書式に見る國家意識の一側面〉，《東方學》118 (2009): 1-21（中文版為〈“中國”的擡頭——明末文章書式所見國家意識的一個側面〉，《日本中國史研究年刊》2009年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²⁴ 在琉球外交文書集《歷代寶案》中，擡寫「中國」的例子不少，儘管並不是一貫的準則（《歷代寶案校訂本》，沖繩縣立圖書館史料編纂室編，和田久德校訂，那霸：沖繩縣教育委員會，1992-2000）。

類兵部文書中有關「中國」的語境，與其說是禮儀上的讚揚，不如說是面臨強敵時的危機意識，比如：「夷人笑〔單擡〕中原之無人也」（第7冊，頁445）、「夷狄相攻，〔單擡〕中國之利也」（第8冊，頁32）等。雖然加以擡頭，但其中國形象與朝貢文書中「德被天下」式的中國形象截然不同，倒與上面所引用的《明文編》中的中國形象頗為一致。

在明代後期的文集、政書等書籍中，擡寫「中國」的習慣也逐漸普及，這個習慣在有關北邊或倭寇等邊境問題的文章中特別明顯。²⁵ 與上述《明文編》、兵部文書一樣，這些文章表示的是，對於夷狄的壓迫和中國的勢力衰弱之危機感。熊廷弼針對女真指出，「年年跋扈之夷，即年年入〔單擡〕貢之夷，年年憂奴之〔單擡〕中國，即年年受〔單擡〕貢之〔單擡〕中國，夷非以畏服貢，我亦以威德來，夷貢而貢之權不在我也。」²⁶ 雖然女真為了獲得利益而繼續入貢，但「中國」已經不是作為天下中心的中國了。這裡所謂的「中國」或許可以置換為「大明」，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末人擡寫的「中國」不僅僅是明朝治下的中國，而且指上古以來一脈相承的扎根於悠久歷史的中國。「漢人有言匈奴不足當〔單擡〕中國一縣」²⁷、「河套實為朔方故郡，三代而下久屬〔單擡〕中國」²⁸等說法表示，他們所擡寫的「中國」之時間範圍遠遠超越了明朝的統治時期。擡頭制度的基

²⁵ 《明文編》中，完全不見擡寫，即便是應該擡寫的「天朝」等字樣，也都以空格處理。就「中國」一詞而言，有的使用了空格，有的沒有。據簡單的調查，空格的有無似乎反映各篇文章在原書中的擡頭、空格之有無。按上述五個分期做統計，可算出擡寫「中國」的事例之大致比率（如同一作者多次使用「中國」之語，算為一件，即便這之中只用了一次空格，也算作「有空格」）。就第一期而言，包括「中國」一詞的有39件，其中1件有空格。第二期為31件中1件，第三期為40件中6件，第四期為31件中6件，第五期為35件中4件，可窺見擡寫「中國」的習慣在明代後期逐漸擴大，儘管沒有成為普遍的規矩。關於詳細的分析，參看拙稿〈「中國」の擡頭〉。

²⁶ 熊廷弼，《按遼疏稿》（見《四庫禁燬書叢刊》）卷六〈謹敘東夷歸疆起貢疏〉（萬曆三十九年·1611）。

²⁷ 趙士楨，《神器譜或問》（見《玄覽堂叢書》）。

²⁸ 曾銑，《復套議》（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卷下。

本原則本來是尊崇現王朝，但明末人對「中國」的擡頭習慣與此原則顯然是相牴觸的。

正如前言中提到的那樣，梁啟超等清末改革派的焦慮在於「（中國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但明末人對「中國」的如此重視，難道不是表明他們「知有國家」嗎？

3 「中國」對「夷狄」

據佐藤慎一，中國歷史上的華夷觀念有兩個側面，一個是「作為實體概念的華夷觀」，而另一個是「作為機能概念的華夷觀」。²⁹ 前者重視「漢族」和「異民族」之間的種族性對比，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公四年），往往發揮排斥異民族的作用。後者則立足於「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韓愈）的觀念，以文明化的程度來劃分華夷，其目的在於把周邊民族廣泛地包進中華世界中。一般說來，在中國王朝的勢力壓倒周邊的時期，「作為機能概念的華夷觀」成為主流，而在中國王朝被周邊民族壓迫的時期，「作為實體概念的華夷觀」出現在前面。³⁰ 中國王朝受到周邊民族壓迫的宋代和明末都可以說是「作為實體概念的華夷觀」盛行的時期，某種愛國情緒風靡一時。葛兆光認為，四夷的壓迫使宋代人試圖證明「中國（宋王國）」的正統性和「文明（漢族文化）」的合理性，而「這種觀念恰恰就成了近世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³¹ 明末人對「中國」一詞的極大關心，也可以說是由於類似於宋代

²⁹ 在這裡所謂的「實體概念」和「機能概念」的涵義大概是指德國哲學者 Ernst Cassirer 的「實體概念 Substanzbegriff」和「機能概念 Funktionsbegriff」的對比，儘管著者沒有明確地解釋。

³⁰ 佐藤慎一，《近代中國の知識人と文明》（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頁 204-205。

³¹ 葛兆光，《宅茲中國》，頁 64-65。

的思想傾向在對外危機中復興。在這個意義來說，梁啟超所謂的「（過去中國人）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的慨歎的確是對中國歷史的過度單純化。

但如果我們把明末人對「中國」的關注和梁啟超關於「中國」的主張做一比較，可發現作為兩者背景的世界觀之間有重要的差異。梁啟超批評過去中國人所知道的自己國名不是王朝名（漢、唐等）就是外來的名稱（支那、震旦等），而主張重新採用「中國」一詞作為國名，之後辯明如下：「（中國這個名稱）雖稍驕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實，亦未始非喚起精神之一法門也。」³² 清末改革派對「中國」的關注，與「民族之各自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這個觀念互為表裡，因此在清末的《實錄》或經世文編裡，成為「中國」的對比概念的詞語，不是「夷狄」、「外夷」，而是「外國」。

與此相對，「民族各自尊其國」這樣的觀念絕對不是明末憂慮對外危機的人士所具有的。萬曆三十七年（1609）初，來朝的建州女真使節團突然拿出奴爾哈赤的書簡，要求在明與女真之間的邊界處建立界碑。³³ 熊廷弼指出其碑文中有「你中國我外國」、「兩家一家」等悖謾語句，說道：

夷志日驕而立碑之說起矣。其曰你〔單擡〕中國我外國，何其悖傲，既並稱國，又稱兩家，何其僭逆。³⁴

在明末時期，「中國」的對比概念仍是「夷狄」，彼我之間被認為存在著不可逾越的上下之分。明代人往往把「中國」和「夷狄」比喻成「陽」和「陰」，也就是說，把他們定位於宇宙論式秩序，比如：「君為陽，臣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陽在內為泰，陰在內

³² 梁啟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文集》之六，頁3。

³³ 有關這一事件，《明神宗實錄》卷四百五十五，萬曆三十七年二月甲寅條和辛巳條有記載，另外《萬曆邸抄》同年同月條也有言及。

³⁴ 熊廷弼，《按遼疏稿》卷二，〈勘覆地界疏〉（萬曆三十七年）。

為否，是以古之聖人汲汲於進君子而退小人，內中國而外夷狄者，無非抑陰而扶陽也。」³⁵ 華夷關係的逆轉被等同於整個秩序的顛倒；「以陰禦陽，以女制男，何殊乎以夷狄令中國，以小人治君子乎？」³⁶ 雖然《明實錄》、《明文編》中也有不少「外國」的用例，但在這裡「中國」和「外國」的對比主要指地理上的內外，似乎沒有像「中國——夷狄」一般的強烈的價值意識。

三、清代前期有關國家關係的概念之轉變

1 清朝初期「中國」的用法

關於清朝一代對「中國」一詞的用法之變遷，郭成康和趙剛（Zhao Gang）分別作過詳細的研究，都強調「中國」一詞在清代的主要用法不是指漢人以及其居住範圍，而是指多民族國家清朝以及其領土。³⁷ 本章的內容與這些研究重複之處頗多，但以下論述的重點卻在於「中國」在清朝的用法之複雜性，亦即，時期性變化，意義的雙重性，以及與其他語詞（「天朝」等）之間的關係等等。

如上述「你中國，我外國」的例子所示，就入關以前的滿洲政權來說，「中國」當然是他稱，但其中似乎有一點複雜的含意。天聰元年（1627）皇太極在致袁崇煥的書簡裡提及明朝在努爾哈赤征討哈達時採取的不公平態度說：

³⁵ 林聰〈修德弭災二十事疏〉，《明文編》卷四十五。

³⁶ 王夫之《宋論》（中華書局，1964），卷七，頁140。

³⁷ 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國觀〉，《清史研究》，2005.4: 1-18; Zhao Gang, "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a*, .32.1(2006): 3-30.

己亥年，我出師報哈達，天遂以哈達畀我，爾國乃庇護哈達，逼我釋還其人民。……爾既稱為中國，宜持公持平，乃於我國不援，於哈達則援之。³⁸

皇太極批評明朝的前提是，基於「中國」作為天下中心應該採取公平的態度這一邏輯，在這裡所謂的「中國」有一種諷刺性的意思。另一方面，把明朝稱為「南朝」的用法在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國時已經開始。在皇太極天聰元年致袁崇煥的另一封書簡裡，他專門使用「南朝」一詞。³⁹「南朝」比起「中國」顯然有否定明朝權威的含意，這是明朝知識人也所熟知。⁴⁰

清朝入關後，《清實錄》中「中國」的用例在順治到康熙初年並不多（參看圖2、圖5），其中比較多的是，言及歷史上的中國之用法，以及借外國人的發言來提及「中國」的用法。比如：「念爾琉球自古以來世世臣事中國遣使朝貢……」、「念爾西域從來尊崇佛教臣事中國……」、「（東西南北）數百國，見海不揚波，咸曰，中國有聖主出焉」、「（吐魯番國王）奏，臣國向以方物進貢中國已久，及聞天朝統一寰區，不勝忻喜」等等。⁴¹這些用例中的「中國」，當然與清朝有密切的關係，但兩者之間的關係有點間接。

康熙年間中期後，「中國」的用例逐漸增加，儘管如明末將「中國」與「夷狄」對比的用法幾乎看不見。值得注意的是，在對俄羅斯的關係方

³⁸ 《清太宗實錄》卷二，天聰元年正月己巳朔條。關於皇太極和袁崇煥之間的往復書簡，參看神田信夫，〈袁崇煥の書簡について〉，《駿台史學》12 (1962): 113-118，後收入於《清朝史論考》，東京：山川出版社，2005。

³⁹ 李光濤編，《明清檔案存真選輯》初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9），頁66-67，〈天聰元年四月初八日金國汗致袁崇煥書稿〉。

⁴⁰ 茅瑞徵《東夷考略》（收入《玄覽堂叢書》，天啟元年自序）指出：「（努爾哈赤）僭號金國汗，建元天命，斥中國為南朝。」

⁴¹ 《清世祖實錄》，卷三十二，順治四年五月丁丑條；卷三十九，順治五年六月辛卯條；《清聖祖實錄》，卷二十五，康熙七年正月庚戌條；卷四十二，康熙十二年四月癸未條。

面，「中國」的用法比較特殊，如從《實錄》中收錄的尼布楚定界碑中看得到「中國」的如下用法：

大清國遣大臣與鄂羅斯國議定邊界之碑。一、……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一帶之溪河，盡屬鄂羅斯。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之南岸，屬於中國，河之北岸，屬於鄂羅斯。……一、從前一切舊事不議外，中國所有鄂羅斯之人，鄂羅斯所有中國之人，仍留不必遣還。

在尼布楚條約的滿文版（沒有漢文的正文）中，指清朝方面的語詞是 *dulimbai gurun*（即「中國」），與漢文譯文中的「中國」相對應。⁴² 在這裡「中國」一詞指的是，有明確輪廓的，與外國有平等關係的國家，這是在清初出現的新現象。據趙剛，有關俄羅斯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漢文上諭中出現「我中國」的說法。⁴³ 對於俄羅斯的關係中，「中國」較容易地被等同於清朝。

下面看《清文編》收錄的清初文章中之「中國」的用例。清初的文章（在這裡姑且把明朝遺民和順治、康熙年間得到進士、舉人資格的人所寫的文章叫做「清初的文章」）中有 29 篇文章包括「中國」一詞。其中顧炎武的文章（幾乎都引自《日知錄》）佔 10 篇，可見《清文編》的編者對顧炎武的重視。應該注意，在清代出版的各種《日知錄》刊本中的用詞與原抄本《日知錄》⁴⁴ 不完全相同，特別有關「夷狄」的字眼被換成別的語詞。表 4 將《清文編》和原抄本對比如下：

⁴² 關於 *dulimbai gurun* 的用法，Zhao Gang 在他的論文中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參看 Zhao Gang, "Reinventing China," pp.8-9.

⁴³ Zhao Gang, "Reinventing China," p.9.

⁴⁴ 本文使用的版本是，黃侃等校勘、徐文珊點校，《原抄本日知錄》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

表4 《清文編》和《原抄本日知錄》的用詞比較

《清文編》中卷數	《清文編》	《原抄本日知錄》
卷八	(標題) 外國風俗	(標題) 夷狄
同上	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	中國之不如夷狄者有之
同上	中國為之虛耗而其俗亦壞	中國為之虛耗而虜俗亦壞
同上	(無)	此固人情之所必至，而戎狄之敗特速於中華者，他日未嘗學問也
同上	外國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	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
同上	外國之能勝中國者惟其簡易而已	戎狄之能勝中國者惟其簡易而已
同上	無所分於中外矣	無論於華夷矣
卷六十三	佛者外國之法	佛者夷狄之法
同上	今吾所處中國耶外國耶	今吾所處中國耶夷狄耶
同上	塞外之風被於華夏	被髮之風終於戎翟

表4表示的是《日知錄》中用詞改變的極少一部分，但足以窺見清代人（即《日知錄》的出版者）怎樣處理有關「夷狄」的語詞。雖然有關「夷狄」的語詞有所改變，但顧炎武用詞中的明末特色僅從表4也能非常明顯地看出，亦即，中國和夷狄互相對比的構圖。與此比較，在收錄於《清文編》的清代中期經世家的文章中，很少出現對這種對比的強烈關心。有些人談到地理上的「中國」，有些人言及歷史上的「中國」，但很少有文章反映「中國」和外國之間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到了清朝面臨西方勢力壓迫的道光年間以後再度明顯起來。

2 雍正皇帝和華夷問題

雍正皇帝對「夷狄」一詞的看法有非常獨特之處。在雍正十一年四月的上諭中，他評論如下：

朕覽本朝人刊寫書籍，凡遇胡虜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為彝，以虜為鹵之類，殊不可解。揣其意，蓋為本朝忌諱，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義，不敬之甚者也。夫中外者，地所畫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諸國，君臨天下。……內而直隸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極邊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納貢，異域遐方，莫不尊親，奉以為主。乃復追溯開創帝業之地目為外夷，以為宜諱於文字之間，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且背謬已極哉。孟子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古之聖帝而孟子以為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為周之臣子，而以文王為夷。然則夷之字樣，不過方域之名，自古聖賢不以為諱也。……夫滿漢名色，猶直省之各有籍貫，竝非中外之分別也。若昧於君臣之義，不體列聖撫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猶泥滿漢之形迹，於文藝紀載間，刪改夷虜諸字，以避忌諱，將以此為臣子之尊敬君父乎，不知即此一念，已犯大不敬之罪矣。嗣後臨文作字，及刊刻書籍，如仍蹈前轍，將此等字樣，空白及更換者，照大不敬律治罪。⁴⁵

雍正皇帝已在雍正六年曾靜案發生之後，下諭旨主張：「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諱。孟子云，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本其所生而言，猶今人之籍貫耳」。⁴⁶ 上引雍正十一年的禁止避諱夷狄等字樣的上諭是進一步發展了這一邏輯的。其實，相同的邏輯可追溯到入關以前，比如在天聰十年四月十五日〈責朝鮮國王背盟書〉中，皇太極指出：

⁴⁵ 《清世宗實錄》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條。

⁴⁶ 《大義覺迷錄》（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一。相關上諭和曾靜口供等收入於《大義覺迷錄》。

爾國（朝鮮）每以南朝為天子，君也，父也，其餘皆屬夷小民也。……古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誠哉至言也。匹夫有大德，即為天子，天子若無德，即為獨夫。是故大遼乃東北之夷而為天子，大金以東夷滅遼舉宋而有天下，大元以北夷混一金宋而有天下，明朝洪武乃皇覺寺僧而有元之天下。考此諸國主天下時，爾朝鮮世修職貢，由此推之，則天下惟有德者主之耳。⁴⁷

在此把雍正皇帝如上華夷觀念的特點整理一下。

（一）就上述「作為實體概念的華夷觀」和「作為機能概念的華夷觀」的對比來說，雍正皇帝的觀念接近於後者，因為清朝的基本主張是，無論在甚麼地區出生，有德者都可以爬上權力的頂峰。夷狄也有機會擁有天下。

（二）如果出生的地區和族群（即「地境之中外」）跟作為人的道德性（即「天分之上下」）無關的話，那麼，「天分的上下」到底由甚麼標準來決定？就歷史上一般的「作為機能概念的華夷觀」來說，這個標準跟漢人文化有密切的關係，亦即，包括服裝髮型、寫作漢文的能力、以儒教為中心的學問等具體內容。因此，「夷狄而中國也，中國之」（韓愈）這種說法中所謂的「中國」化，實際上意味著「漢化」。但雍正皇帝的獨特之處在於，把「天分之上下」和「漢化」分割開來。據他說：

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義存心。若僻處深山曠野之夷狄番苗，不識綱維，不知禮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獸無異之名，至於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爾喀等，尊君親上，慎守法度，盜賊不興，命案罕見，無奸偽盜詐之習，有熙皞

⁴⁷ 張存武、葉泉宏編，《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 一六一九—一六四三》（臺北：國史館，2000），頁183-184。

寧靜之風，此安得以禽獸目之乎？⁴⁸

蒙古人雖然在風俗上沒有漢化，但他們作為人類的優良品德值得稱讚，所以就「天分之上下」來講，還屬於上級。

（三）雍正皇帝對「夷狄」一詞的看法也跟一般的「作為機能概念的華夷觀」有不同。在一般的「作為機能概念的華夷觀」中，因為「華」和「夷」之間有價值上的上下，即，「華」體現文明，「夷」體現野蠻，所以「夷」人應該變成為「華」人。但據雍正皇帝，「夷」不過表示出生的地點，好像是「籍貫」，並不是貶稱。因此，「夷」人可以終身為「夷」，不需要努力變成為「華」。

下面看雍正皇帝對「中國」一詞的用法。我們讀《大義覺迷錄》時感覺，雍正皇帝對「中國」沒有自我認同。「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我朝入主中國，……乃中國臣民之大幸」、「倘若外國之君入承大統，不以中國之人為赤子，則中國之人其何所托命乎？」⁴⁹——這些說法都帶有一種「我們滿洲人」說服「你們中國人」的口吻。這是因為《大義覺迷錄》是清朝皇帝以漢人知識人為對象而編寫的書。對待漢人知識人的時候，「中國」屬於「你們」，但對待俄羅斯等外國的場合，「中國」屬於「我們」。雍正皇帝自傲地說：「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我朝者也。」⁵⁰「中國」有時候意味著秦代以來的狹義的中國，而有時候意味著「中外一家」的廣義的中國。作為出自外疆而支配廣大版圖的王朝，清朝不得不接受這種雙重的「中國」意識。

在狹義的「中國」來說，「中國人」幾乎等同於「漢人」。表5表示《清

⁴⁸ 《大義覺迷錄》卷一。

⁴⁹ 都引自《大義覺迷錄》卷一。

⁵⁰ 《清世宗實錄》卷八十三，雍正七年七月丙午條。

實錄

「漢

表5

《清

《賀

《葛

《阿

《清

幾乎

到

除

國的

世

3

一

間

明

用

說

係

字

關

實錄》和清代各種經世文編中「中國人」（包括「中國之人」）、「華人」、「漢人」出現的頁數。

表 5 《清實錄》和清代各種經世文編中「中國人」和與此相關的語詞

	中國人	華人	漢人
《清實錄》	30	31	494
《賀氏正編》	3	9	44
《葛氏續編》	49	63	23
《陳氏三編》	71	152	3

《清實錄》中，「中國人」、「華人」在咸豐年間以後纔增加，道光以前幾乎沒有。通過三種經世文編的比較，也看得出同樣的傾向，即：從「漢人」到「中國人」、「華人」的時期性變化。表 5 也許暗示，在清代前、中期，除了上述跟俄羅斯的定界等場合之外，並不迫切需要尋求一種表示廣義中國的居民之語詞。順便指出，「大清人」這類語詞在《清實錄》和清代經世文編當中都看不到。

3 「天朝」和「外夷」

揚棄這種「中國」意識的雙重性而在乾隆年間重新登場的是「天朝」一詞。從《實錄》來看（圖 3、圖 4），「天朝」的使用頻度在明末隆慶年間以後逐漸增加，清朝入關後幾乎絕跡，而在乾隆年間突然再度增加，在明清兩代五世紀半當中呈現最高峰。更加仔細看（圖 5），可知「天朝」用例的明顯增加始於乾隆十年代，乾隆末期達到頂峰。

在「天朝」的使用例增加之同時，「外夷」的用例也突然增加。很難說這一現象跟上述雍正皇帝禁止避諱「夷、虜」字樣的上諭到底有多大關係，但乾隆年間的清朝已經充滿著自認為天下中心的自傲意識，對「夷」字的不安感覺也似乎已經消失了。「天朝」和「外夷」成為清朝論述對外關係時的一對標準詞彙。

「天朝」這個語詞必定被用於對外關係的語境，但「對外關係」是甚麼意思？比如，清朝版圖內的土司等屬於「外」嗎？下面看看《清高宗實錄》中的用法。從乾隆初年到十一年，「天朝」出現在有關西南苗人、準噶爾、安南、呂宋、天主教等記載中。乾隆十二年到十四年，有關金川的記載中，「天朝」頻繁出現，這是在此時期「天朝」用例急速增加的理由。之後，乾隆皇帝所謂的「十全武功」都構成「天朝」用例集中出現的背景。「十全武功」中與清朝作對的不一定是「外國」而包括版圖內的族群集團。在這個意義來說，「天朝」未必是具有明確的地區性輪廓之概念。在有關朝鮮、琉球等諸國的朝貢、漂流民等問題中，「天朝」一詞也偶爾出現，但為數不多。此外，乾隆二十四年的洪任輝案和乾隆五十八年的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是「天朝」一詞被用於西洋相關案件的例子。俄羅斯也被認為處於對「天朝」的從屬地位。

與明末的「中國」的使用例不同，乾隆年間的「天朝」幾乎不帶有受外部勢力壓迫的危機感，儘管「十全武功」不一定得到成功。「天朝之威靈」、「天朝兵威」、「天朝懷柔遠人之義」等等構成了使用「天朝」一詞的語境。

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二年的上諭中斥責了地方官將發給緬甸的檄文的文字內容，指出：

有永昌府檄緬甸文稿，閱之深可駭異。……傳諭外夷，立言亦自有體。乃其中有「數應歸漢」一語，實屬舛謬。夫對遠人頌述朝廷，或稱天朝，或稱中國，乃一定之理。克我國家中外一統，即蠻荒亦無不知大清聲教。何忽撰此歸漢不經之語，妄行宣示。怪誕已極。⁵¹

⁵¹ 《清高宗實錄》卷七百八十四，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己巳條。

由此看來，當時「對遠人頌述朝廷」時應該使用的語詞是「天朝」或「中國」，而不是「漢」。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清朝統治者不是「漢」，而「漢」這個語詞沒法代表清朝統治下的廣義的中國。但永昌府的這一失誤似乎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在西南方面，常常用「夷—漢」、「苗—漢」等對比來表示族群關係，在這裡「漢」比較容易被等同於「中國」。

在《清高宗實錄》裡，「天朝」的用例比「中國」為多（參看圖5），但在乾隆年間的政府文書中，兩者的意思差不多，所以可以互換。比如，在馬戛爾尼訪華時的檔案中，雖然「天朝」出現的次數比「中國」絕對地多，但英國方面的文書之翻譯中常常使用「中國」，比如，「中國大皇帝」、「求與中國永遠平安和好」等。⁵²一般地說，清朝的文獻中對「中國」一詞不加以擡頭，但這裡使用單擡。有時，清朝政府在一張文書中同時使用「天朝」和「中國」這兩個語詞，比如，「爾等不諳中國體制，冒昧瀆請，天朝定例甚嚴，應准應駁，無不按例而行」。在這裡，「天朝」和「中國」的含意沒有甚麼不同。⁵³這裡所謂的「中國」當然指廣義的中國，即，實現中外一家的清朝以及其支配下的版圖。

有意思的是，在《清實錄》中，「我中國」這個說法到了乾隆年間纔出現。乾隆三十五年對緬甸下的上諭中，乾隆皇帝自誇如下：

我中國撫有函夏，東自高麗琉球及東洋西洋諸大國，南則交趾以南諸國，北則準噶爾全部，西則回部數百城，竝入版圖，歲時朝貢，何物蔑有。爾彈丸僻壤，即竭力具貢，有何珍異足為比數。⁵⁴

⁵²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彙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頁162-164。

⁵³ 同上書，頁128。

⁵⁴ 《清高宗實錄》卷八百五十四，乾隆三十五年三月癸未條。

與《大義覺迷錄》中的「中國」不同，乾隆朝《實錄》中出現的「我中國」純屬清朝的自稱。通過乾隆年間的「盛世」，清朝的「中國」概念之重心，逐步擺脫他稱和自稱的雙重結構而移動到自稱。

下面把乾隆年間的「天朝（中國）」、「外夷」這兩個對比性概念的特點整理一下。

乍看之下，乾隆年間的「天朝—外夷」的對比構圖和明代的「中國—夷狄」的對比構圖之間，頗有共同之處。兩者的確都是華夷觀念的體現。但兩者之間有很大的不同，即：明代（特別是明末）的「中國—夷狄」構圖有「作為實體概念的華夷觀」的性質，而乾隆年間的「天朝—外夷」構圖是「作為機能概念的華夷觀」之典型。再加上，跟一般的「作為機能概念的華夷觀」不同，清朝所謂的「天朝=中國」的優越性之基礎，不在於具體的風俗上、文化上的特點——比如漢字漢文，衣冠禮儀等，而在於更為抽象的仁義道德。因為這種仁義道德的存在與否，沒法用具體方法來證明，所以清朝統治的正當性之根據，歸根結底是清朝能夠形成「中外一家」的廣大版圖這個事實。「中國」概念和「天朝」概念相融合的過程中，「中國」概念在擴大到包括多民族的同時，失掉其明確的輪廓和具體的文化內容。

Joseph R. Levenson 在題為《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的精神》的著作中，將文化主義（culturalism）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m）做了對比，指出：

文化主義排斥外國思想，但對外國勢力的實質上的侵入，採取幫助或不積極反對的態度。與此相反，民族主義接受外國思想，但對外國勢力的實際上的侵略，極為憤怒。……競爭的感覺是民族主義的本質；如果人不認識在有忠誠的國民的同時又有強大的威脅能力的他國之存在，他不會鼓吹「我的國家」。與此不同，中國真正的、舊式的文化主義者並不具有競爭的觀念。在他們來說，中國文明是唯一的文明。……夷狄可能征服中國，……但一般地說，征服者為中國文化的不可抗拒的魅力所吸引，很快地失掉他們的民族特

質。⁵⁵

清朝第三期的「中國—外國」的對比構圖的確符合於 Levenson 所指出的民族主義的特色。但乾隆年間的「天朝」觀念未必完全一致於他所謂的文化主義。乾隆時期的「天朝」觀念否認與清朝分庭抗禮的競爭敵手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頗為接近於文化主義。可是，支撐其「天朝」觀念的到底是甚麼「文化」呢？這當然不是以不可抗拒的魅力來感化夷狄的中國文化。Pamela K. Crossley 指出：「清帝國是普遍的，因為乾隆皇帝的統治在文化上是無色的（culturally null）。乾隆皇帝通過他的行為（包括委託製作文學、建築、繪畫、肖像畫等的作品），對所有的文化賦予了現實性和意義。」⁵⁶

明末的「中國—夷狄」的對比構圖也跟 Levenson 所謂的文化主義有所不同，因為明末人一方面相信中國文化的優越性，但另一方面對夷狄的侵略極為憤怒。

結語

乾隆時期形成的「天朝—外夷」的構圖通過十九世紀中葉的對外戰爭被迫轉變，為「中國—外國」觀念所取代。對於這個轉變的過程，已經有許多學者作過研究。回到本文開頭所引的梁啟超所謂「吾國無國名」的問題來說，這不是單純的「從傳統到近代」的轉變問題。「傳統」本身極其

⁵⁵ 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10-111.

⁵⁶ Pamela K.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221. 關於這個問題，還請參看平野聰，《清帝國とチベット問題——多民族統合の成立と瓦解》（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4）。

複雜：明代的「中國」、清代前期的「中國」、清代中期的「中國」和「天朝」都有不同的含意。那麼，梁啟超所面臨的是甚麼傳統？梁啟超所謂的「吾國」指的是甚麼範圍？

在光緒二十七年發表的《中國史敘論》中，梁啟超舉出六個「人種」作為「中國史範圍中」之主要人種，即：

- (一) 苗種：「是中國之土族也。猶今日阿美利加之紅人、澳大利亞之黑人也。」
- (二) 漢種：「即我輩現時徧布於國中，所謂文明之胄、黃帝之子孫是也。」
- (三) 圖伯特種：「現居西藏及緬甸之地，即殷周時代之氐羌……宋時之西夏，皆屬此族。」
- (四) 蒙古種：「今日蔓延於內外蒙古及天山北路一帶之地，元朝即自此族起，混一中國，威震全地。」
- (五) 匈奴種：「今自天山南路以至中亞細亞一帶之地，多此族所占據。漢代之匈奴……唐之回紇……皆屬此族。」
- (六) 通古斯族：「自朝鮮之北部經滿洲而蔓延於黑龍江附近之地者，此種族也。……今清朝亦自此興者也。」

梁啟超把數千年的歷史分為如下三個時期：

- (一) 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統一，是「中國之中國」的時期，此時期是漢族內部的競爭和團結的時代。
- (二) 中世史，自秦統一後至清代乾隆末年，是「亞洲之中國」的時期。在此時期，中國民族和上述亞洲各民族通過激烈的競爭，漸向於合一之勢，為全體一致之運動。
- (三) 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是「世界之中國」的時期，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⁵⁷

在這裡梁啟超勾畫出的「中國史」的範圍是相當複雜的。在上古時期，「中

⁵⁷ 《飲冰室文集》之六（《飲冰室合集》1），頁5-12。

國史」是漢人的歷史，但在中世時期，以漢族為中心的許多民族逐漸向於合一，「中國」的範圍擴大了。由此得知，梁啟超所謂的「吾國」未必是狹義的中國，即漢人的中國，而是包括多民族在內的廣義的中國。

假如他構想的「吾國」是狹義的中國的話，他也許能夠在歷史上（比如宋代或明末）比較容易地尋求防衛「中國」的愛國傳統。但他所謂的「吾國」是廣義的中國，就是許多民族在競爭的同時逐漸合一起來的複雜過程的產物。就其範圍來說，其所謂的「吾國」比明末的狹義的「中國」概念更接近於清代乾隆年間的與「天朝」融合的「中國」概念。但乾隆年間的「中國」概念也未必適合於他追求的國家概念，因為它缺乏跨越朝代而繼承下來的民族性文化內容和明確的集團性、空間性輪廓。宜乎其有「吾國無國名」之歎。

現在「中國史」這個名稱已成為不言而喻的存在，但梁啟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問題，仍然令人深思。

Zhongguo (China) and *Waiguo* (Foreign Countries) – Diction of National and Foreign Relations in Ming Qing Historical Records

Kishimoto Mio

Ochanomizu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use of the words related to foreign or ethnic relations –e.g., *Zhongguo* (China), *Tianchao* (the Celestial Empire), *yidi* (barbarians) etc. –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changes in national or ethnic identities of rulers and intellectuals in China. Main sources used include the *Shilu*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several kinds of *Jingshi Wenbian* (Statecraft Anthologies), which are analyzed both 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ly.

Throughout the Ming period, *Zhongguo* and *yidi* were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terms to describe hostile foreign relations, with the antagonistic sentiment against barbarians reaching its peak in the late Ming. During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the Qing reign, words such as *Zhongguo*, *Tianchao* and *yidi* rarely appeared in either governmental documents or statecraft literature. Around the Qianlong period, *Tianchao* and *waiyi* (aliens) became the standard terms used to express the supreme authority of the Qing Empire, whose power should prevail all over the world. Though the dichotomy of *Zhongguo* and *yidi* in the Ming period seemingly resembles that

of *Tianchao* and *waiyi* during the mid-Qing, they were rather different because the former contrast was based on the sense of ethnic superiority while the latter on the more abstract notion of moral excellence. After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 pair notions of *Tianchao* and *yidi* were replaced by *Zhongguo* and *waiguo* (foreign countries). This change has often been explained as a conversion from a traditional view of the world to a modern one, but the complexity and historical changes that existed within the traditional views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be ignored.

Keywords: *Zhongguo*, *Tianchao*, *yidi*, *waiguo*, Liang Qichao